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四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014034950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四卷

A753

01

V4 1949-1976

主编

陈晋

李捷

主

编

逢先知
冯蕙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熊华源

吴正裕

张素华



A753
01
V4
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航

C1714774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冯 蕙 张素华 郝首栋

目 录

1959 年 4 月—12 月	(1)
1960 年	(298)
1961 年 1 月—6 月	(515)

1959 年 六十六岁

4月1日 下午，同邓小平、彭真^{〔1〕}谈话。晚上，同朱德^{〔2〕}谈话，后同陈伯达、陈正人^{〔3〕}谈话。

4月2日—5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和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和决定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八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4月2日 上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举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

〔2〕 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两职分别任至1959年4月27日、28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毛泽东的秘书。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副主任。1959年6月、8月又先后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

行，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刘少奇^{〔1〕}主持。邓小平说：经过中央计委、经委、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最后核定今年钢的数字是一六五〇万吨。即使搞不到一八〇〇万吨，搞一六五〇万吨洋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

同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2〕}、朱德、陈云、林彪^{〔3〕}、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会后，同胡乔木^{〔4〕}等谈话。

同日 阅王任重^{〔5〕}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王延春^{〔6〕}等写的《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材料，写批语：“这几个文件^{〔7〕}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静，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报告

〔1〕 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至1959年4月27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2〕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

〔3〕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4〕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毛泽东的秘书。

〔5〕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华中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

〔6〕 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7〕 指王延春等1959年3月27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中共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晚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和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3月23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

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采取县委的会议和公社的会议一起开的办法。到会者中，生产队干部二千五百人，生产小队干部五千六百人，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和观潮派、算账派。会议期间，有一部分人来来往往，把会内会外联系起来，把开会和领导生产结合起来，把干部开会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会议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基层干部大受感动，也纷纷检讨，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了。检讨之后，最重要的是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兑现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4月3日 阅谭震林^{〔1〕}本日关于各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信，写批语：“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1959年4月28日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毛泽东的批语和谭震林的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先念^{〔1〕}、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2〕}、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3〕}出席。会议确定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一六五〇万吨（洋钢）。

同日 审阅邓小平起草的准备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的

〔1〕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财政部部长。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

〔2〕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局（1960年11月撤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1年2月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3〕 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任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两个问题的说明（要点）”，批示：“很好。即还小平同志。”这两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工作和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关于经济工作，说明要点指出，这次上海会议将一九五九年钢的计划指标确定为一八〇〇万吨^{〔1〕}。根据钢和煤指标的变动，相应地变动了一些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指标。粮食、棉花，武昌会议已经公布的数字（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不变。粮食和棉花以外的其他一些农产品产量指标都有一些降低。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说明要点指出，中央政治局已经向全会提了一个方案，全会各小组进行了讨论，都表示同意这个名单。为国内外瞩目的，主要是几个主要工作岗位的人选问题。我们认为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2〕}同志为副主席，朱德同志为人大常委委员长，周恩来同志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和政协主席，是比其他方案更为适当的方案。

同日 阅王任重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写批语：“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静；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报告说：两天来，会议情况又有新的发展，在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矛盾初步解决之后，转到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上

〔1〕 这里讲的1800万吨钢中，洋钢为1650万吨。

〔2〕 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均至1959年4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两职分别任至1959年4月27日、28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来了。因此，县委决定大力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具体做法是：一、县委分别开动员会，表示算清账目的决心。要算五笔账，多劳多得账，成本账，超产奖励账，收入账，开支账。要三个兑现，超产奖励兑现，多劳多得兑现，拿群众的东西退赔兑现。二、分别开小组会，进行酝酿准备。三、交代政策，个别谈话，解决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的顾虑。四、开会和搞试点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五、开广播大会，明确宣布一九五八年的收入，除上交农业税和上交公社的百分之几以外，余下的都归生产队，要求各生产队都把去年的账目算清，同时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要在会上交代出来，承认错误，具体算账回去再搞，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同日 阅王任重四月二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批示：“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照办理。”报告说：几天来，麻城县会议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解决好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的重要性。算账是政治问题、政策问题、立场问题，一定要算，算到底。打开算账的局面，关键在于深入开展思想动员，防止任何简单粗暴行为。对报告中的“对待生产队的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在大跃进当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的人是好干部，然后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贪污多占的错误，诱导大家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是在于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毛泽东的批语、批注和关于麻城万人大会情况的三次报告，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4月4日 阅邓小平四月三日关于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各组讨论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的意见给毛泽东等的信，信

中说：我的意见是“毛主席仍应作政协名誉主席，这次也需要重选一次”。毛泽东批示：“我没有上届是名誉主席的印象。如果上届没有就不要增，请查一下。如果有，可以照旧。”〔1〕

同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批示田家英〔2〕：“要在今天改好，晚上印出，发给各省第一书记带回去。”毛泽东对修正稿作了一些修改。修正稿说：“也有少数是以几个原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大队，或者相当于原高级社联社的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以几个小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些做法，如果群众同意，也是可以的。”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如果群众不同意，则不要这样做。总之，要按群众的迫切要求办事。”修正稿说：“上级规定增产技术措施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各地情况不同，使下面能够因地制宜。”毛泽东将句中的“也要”改为“必须”，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不管当地情况的区别，由上面强制规定的所谓增产技术措施，例如强制规定种植的密度，是很危险的。”修正稿说：“要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公社部分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生产队部分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急是不行的。”毛泽东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改为“要许多时间”，并在这段话后加写：“这种改变，在经济上不能使任何一个生产队、生产小队和任何一个人吃亏，而只能使他们较之以前

〔1〕 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1959年4月，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继续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更有益处。”修正稿说：“在将来，在把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的时候，也要根据广大社员群众的自愿。”毛泽东将这句话修改为：“在将来，在具备了物质条件可以把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的时候，还要一个政治条件，即社员群众的自愿。”在修正稿的第八个问题中提出计划指标、争取指标、包产指标，毛泽东批注：“三种指标不适宜，只要包产指标与争取指标^{〔1〕}两种。”

同日 晚上，同田家英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修改问题。四月五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二十日，中央办公厅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中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经过修改，把原稿中的一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十八个问题。

4月5日 上午，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共十六个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一）多谋善断。单是谋不行，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一月二十六日这个会是我建议开的。其原因就是一月上旬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那个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说，那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比如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了他估计今年

〔1〕 这里的“争取指标”应是“计划指标”。在后来修订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上海会议纪要中，删去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中的“争取指标”的提法，只有计划指标和包产指标。

完不成计划，这种话应该听。前天我同乔木同志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顶回去了。这里有两个观点不正确。一个观点，不认识大会有时候就出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第二个观点，是个组织关系，乔木应该跟我反映，跟书记处别的同志谈一谈。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二）留有余地。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政治问题，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三）波浪式地前进。我反对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马鞍形将来还是有的，就是波浪式地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四）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五）观察形势。有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毫无主动。武昌会议是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的。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没有提出意见，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但到武昌，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经过郑州会议（指第一次郑州会议——编者注），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后头大家定了两千万吨。（六）当机立断。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

武断。我也有武断，比如在郑州会议（指第二次郑州会议——编者注），说一般不算账，这是人们向我建议，我也同意写上去，这不是个武断？恰好相反，一般要算账。这种错误我们这些人是经常犯的，问题是要快一点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要改。（七）与人通气。要跟同志们、朋友们、上级和下级的同志们通气。与人通气的时候，反面的话要想一想，那个反面的话很值得注意。（八）解除封锁。他们搞工业的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等到开会的那天还不知道。你先让人家略微知道一点，慢慢浸润，细水长流，不要突如其来，倾盆大雨。我现在要求解除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这是因为真理在这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多数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但是有些时候，个别的人要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位同志手里。列宁提出反潮流，有许多时候是这样，要反潮流，北戴河会议是高潮，武昌会议是中潮，北京会议〔1〕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没有能够改变。我那个时候有心改变，但是没有人跟我商量，也不听陈云的话。（十）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这个过程，我们得总结一下。客观事物是在实践中间逐步认识的。我所有讲的这些，批评的这些，包括我自己在内。（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来。现在有相当多看不懂的文件，而主要出于我们工业界，工业界的文件就是使人看不懂。我希望以后不要拿出这样的文件来，要用口语写出来，每一个问题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最近我们搞西藏问题公报，搞了三天，逐步深入，差不多把一切问题都交代清楚了。这是让中国的共产党员，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全国人民了解这个情形，是

〔1〕指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以他们为对象来写这个问题的。原先那个稿子就不行，那个稿子不晓得以什么人为对象。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这里有一个实质的原因，就是对于那个事物自己并不甚了解，自己并没有作到认真的分析，没有落实，没有注意读者的心理。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文章是口语。（十二）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你们如果赞成，就照这样办。我现在要求这个权力，不挂帅不行。解除封锁，与人通气，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地前进，注意个别人的反对意见，从北戴河会议到上海会议的这段时间的经验，文件问题，这些东西都要有这一条才能保证。重大问题的文件首先要在常委会讨论大纲。大的估计，整个形势，要先讨论，讨论清楚，然后你们再去作计划。（十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唐朝人的两句诗。^{〔1〕}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十四）我想找几位通信员名字叫做秘书，先在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二部（冶金部、一机部）找，然后再找几个部。（十五）李锐^{〔2〕}怕鬼。你前怕龙后怕虎，很多顾虑。（十六）我批评的这些人，以及没有批评的，都是好同志，我没有偏心。但是要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使同志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你们的缺点我要批评，我的缺点你们也批评。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3〕}同志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编者

〔1〕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见明代顾大典《青衫记》。唐朝人的两句诗是“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见唐代朱湾《奉使设宴戏掷筭筹》一诗。

〔2〕 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通信秘书。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注)看。你们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是很不客气。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他想沿黄河、长江进行考察,说:从黄河口子上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做警卫,搞个地质学家,搞个生物学家,或者搞个文学家,搞这么三个,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汽车,就是骑马。骑骑走走,走走骑骑,一起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到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为止。我有这个志向,我现在开支票,但是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很想学徐霞客。最后,他说:我这个讲话你们不要迷信,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对的就是对的,这要从实践中才能看得出来,现在这是观念形态。

同日 晚上,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7日 晨零时,同谭震林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的修改意见。

同日 就调查研究藏族情况,致信汪锋^{〔1〕}:“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一)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是不是?(二)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三)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四)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八万,对否?(五)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六)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七)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八)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九)叛

〔1〕 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十）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十一）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四省共有二百多万至三百万，对否？（十二）这四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十三）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四月，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五三期至第二七五七期，分别登载了《青海藏区封建上层的特权》、《四川藏区基本情况》、《西藏的基本情况》、《西藏的农奴制度》、《甘肃藏区基本情况》等五篇报道。

同日 阅新华社四月五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七九二期刊载的印度新闻社记者从噶伦堡发出的关于西藏叛乱的两篇报道，批示：“即送周总理阅。这个新闻社的这两篇报道，是不利于尼赫鲁^{〔1〕}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请与吴冷西^{〔2〕}一商。”第一篇报道说：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人举行秘密会议，要求住在当地的西藏人为即将到来的叛乱做好准备，对希望参加叛乱的人进行了登记。会后，一些西藏人回到西藏帮助准备叛乱。第二篇报道说：噶伦堡同情西藏叛乱的人中有一个人说，叛乱并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突然发动的。叛乱是有计划的，早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2〕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